

第一阅读

弘扬中华传统医学的匠心之作

——评长篇小说《天命》 □胡平



新冠疫情在当代人类历史上是大事件，也必然为当代世界文学史提供大题材。可以想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出现以疫情为背景的风靡一时的文学作品，影视剧戴口罩的人物面貌也可能成为一种“典型”。它们会是一段人类生活的特殊记录。

在中国，我们最先见到以抗疫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之一便是王晴川、李治邦创作的《天命》，不论作品将来获得的声誉如何，仅从其贴近时代、贴近现实的创作精神看，便值得给予充分肯定。疫情至今仍未消散，进行最近距离地观照和书写，无疑面对许多难题，但正因如此，通过文学作品巩固人们的抗疫信念、鼓舞民众彻底战胜疫情的坚强意志，也是适逢其时的。使这部作品显得格外突出。

《天命》着重讲述了北方城市卫市中医总医院院长庄合超、中医药大学女博士齐美琳等中医人排除万难、携手抗疫的故事，并将背景延伸到民国年间发生的疫情大流行之中，刻画了几代中医人以传统中医典籍为依托，开拓创新，悬壶济世，与西医合作共克时艰的高尚情操。显然，这是一部弘扬中医国粹、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作者的立场是明确的。

关于中医药在抗击大规模疫情中的实际作用，社会上始终存在各种争议，小说不但没有回避这些分歧，反而正面描写了一系列现实冲突。庄合超要儿子庄永昆继承家族事业学中医，妻子肖芸却要他攻西医。庄永昆对中西医都不感兴趣，勉强从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去当了公务员，造成家庭战争，导致父母离异。庄合超的助手齐美琳是中医药大学即将毕业的女博士，在遇到庄之前，对中医的体系和疗效仍旧没有信心。卫城新冠疫情蔓延之际，庄合超所提出的建立以中医为主的抗疫医院的主张，遭到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的明确反对，他所提出的中医治疗方案迟迟不能获得批准。总之，无论在社会、家庭，还是医疗系统内，怀疑中医疗效者大有人在。小说所设置的另一条叙事线索，追溯到民国年间的霍乱疫情与中医命运。那时，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甚至正式出现《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提案，引发一场风暴。或者说，《天命》所设置的基本情境，便是在对待中医学态度上的严重冲突，这种冲突由来已久，但往往在病毒肆虐之际达于高潮，引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由衷关注。在《天命》之前，大概还没有一部重要作品正面展开这种冲突，所以，这部作品的主题十分郑重且具有开创意义，体现了作者不寻常的社会责任感。

作品的显著价值之一，正在于通过生动的情节实现了强有力弘扬中医文化的效果。借助对白芸堂孤本《伤寒杂论》等典籍的发掘，庄合超研制出祛毒清肺汤药剂，在关键时刻立下不成功便辞职问责的军令状，最终处方在临床中发挥奇效，挽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并治愈了冯平那样坚定的“中医黑”、医院院长于湛等人，使他们幡然改变对中医的怀疑。齐美琳驰援武汉，运用中医药成功在以西医为主的医院里将刘大妈等患者从生死线上挽救回来，也最终使自己树立起职业自信心。庄妙妙出差采访，在重灾区滞留，通过手机与叔叔庄合超联系，庄合超隔空对症下药，顺利使她的男友何锋之恢复健康。类似的一系列情节，在作品里展现出中医药疗法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卓越功绩，强烈地感染了读者。但作者并不偏颇，没有力图以中医排斥西医，相反，接续强调了中西医结合的疗效，态度公允客观。殊为难得的是，小说完整记录了庄合超等中医医师开列的具体药方、剂量，文字清楚，可见所列方剂皆有据可查，出自临床实践。

作者精心设置人物架构，主要人物集中在一个中医家族及亲友圈内，关系紧密又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功能，从庄凤梧、徐良英到庄仲衡、庄合超、齐美琳、庄永昆等，人物大都给人们留下了较为鲜明的印象。同时，作者并不仅在职业中写人物，也注重写他们的感情生活。其中，主人公庄合超和齐美琳、肖芸的关系格外引人注目。庄合超性格冷漠，起初使齐美琳望而生畏，不敢接近，最后，是共同的价值观念使他们走到一起。齐美琳的牺牲，又给他带来沉重的打击。前妻肖芸与庄合超的离异，更多出自自戕性上的隔阂，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以及疫情中的合作，她又对他产生新的感觉，那么，两人是否还有前景呢，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留给读者许多想象。应该说，小说中主人公经历的感情体验是特殊的，染有陌生感，使读者不断产生探知其内心世界的欲望，也使抗疫功臣的形象更为丰满。两位作者对于如何塑造超越主题的人物是有一定经验的。

小说中的道具运用也显示了作者老到的创作经验。一部张仲景的《伤寒杂论》，为白芸堂手抄孤本，先为庄凤梧珍藏并集注，成为庄家的传家宝，几经日本人的争夺，后在庄合超的潜心钻研下，发掘出著作中救治寒湿疫的精髓，于抗击新冠疫情中斩获奇功。一只凝聚风筝绝技的老鹰风筝，由齐美琳父亲齐宜赠予庄合超父亲庄仲衡，也属于家族收藏珍品，与《伤寒杂论》一道，成为庄家重视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篇末，风举腾空飞翔，寄托了武汉解封后人们心情的冉冉向上。这些小说元素具有闪光的品质，来自创作中的着意追求，它们的加入，无疑增添了作品的厚重感。

《天命》所展示的现实场景是开放的，不仅写出了新冠疫情下国医们的作为，也书写了普通国民的现实心态，以及群众临危不乱、团结面对的担当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所描绘的历史场景则赋予作品展现中华抗疫史的辽阔纵深感，使人打开眼界，感受到人类面对疫情的开阔胸怀。整部作品在内容结构上获得了对映的复调力量。写这样一部书，要比写平常的小说多付出成倍的努力。这份用心表现出作者颇为严肃的写作态度，能够看到他们长期的艰苦而细致的创作准备，相信这部作品会赢得读者的信服。

心灵的至福是安宁

——远山远长篇小说《安宁街》读札 □王冷阳

这是一部集结了青春、别离、爱、抑郁、生命和死亡等诸多元素的小说。作者远山远凭借遒劲的笔力、纯熟的写作技艺，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一代人绮丽而多舛的青春与困惑、幸福与苦痛交织的精神特质。

在十余载的出版界，旅行文学曾一度空前高涨，但大多是以情感治愈为单线贯穿文本，鲜有触及人的命运状况的深层剖析与审视。《安宁街》不同于以往的旅行文本。它除了沿着情感线索磨合叙事之外，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内心成长与蜕变，通过情感、场景、人与物的关联挖掘人的本始性情及心灵图景，关注人与世界的联结并进行细致入微的描摹与还原，针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检视人的生命原色与情感世界的细腻纹理。

小说写了九个地点，设为九章。每一个地点都是一段难以磨灭的生命印记，都是一次情感的渐进式疗愈与灵魂的丰盈之旅，风景更迭，生命演进，人在觉知、别离、归来、相聚中挣扎、觉醒，不断有人进入我们的视野，也不断有人退出我们的生活。生而为人的一大难题，无外乎追索有限生命与无限永恒的意义叠加的焦点和平衡。

小说以时空转换层层剥开人的情感。主人公京琅一开始的茫然、无助、興味索然，随旅途的深入而渐次改变。她坐他的车前往青海湖，途中遭小混混纠缠，她挺身而出化解了险情，护她平安。逝去的事物仿若幽灵般超过了时间的刀口。整部小说更像是瑰丽的非虚构散文，通过大量特写，丝丝入扣地呈现出人与事最真实的部分。她在牛羊当道时留下的影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陈一懂的手机壁纸上；她在马背上翩然驰骋的影姿，被定格为一幅唯美的图像。他们在那科加一家奶茶店歇息、进餐，偶遇了一位在此地痛失妻儿的陌生大哥。大哥沉浸在追忆中。对京琅来说，她人凄惨的命途，此刻或许转换成了一种反推动力，将她从痛苦的深渊往回拉了一把。当人陷入命运的摆布，走出去看看这个广袤的世界，便可在“人世”中斩获源自生命深处的能量。

作品凸显了一个观点：只有爱，才能治愈爱。爱一个被感情伤过的人，“就像要在废墟里栽培出一朵玫瑰。又苦，又累，还容易让人伤心”。然而西北之行归来，她仍爱上了一个人。她崇尚在百般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葆有宁静、温暖、纯粹等品质的人与事物。而陈一懂正是综合了上述特质的人。他和她都是现代都市中梦境般的异类。那么，小说写到最后，到底是治愈了她，还是相反？或者，二者皆然？

京琅前任孟孟则代表了“寒门贵子”“精英阶层”一员。他们常常在事业上高歌猛进，又常常在爱情中丢盔弃甲。或许出于维护小小的尊严、难言之隐，抑或来自对爱情的谨小慎微、犹豫迷茫。在太多小说文本中，作为“凤凰男”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婚恋一次次在情感的深渊中坠羽。

准确说这不是直接来自他们的错，更不是女友们的错。究其深层原因，这一切或许源于都市与乡村两种文化体系在现代文明大融合表象中暴露的难以兼容的症结。他们宁可放弃才貌双全的“完美女友”，转而投奔才貌平平却“小鸟依人”的婚恋模式，进而与生活达成妥协、和解。

无论是京琅的情敌许颀颀还是耿伽，她们从未在“镜头”中获得清晰的影像。或者说，她们在每个人的命途中扮演陪衬，同时又以波浪的形式把正确的人荡漾给自己。命运女神眷顾的是从泥淖中突围，心灵清洁、纯粹、永不丧失爱能力的人，京琅是，陈一懂也是。这样的人相互遇见，是上天布设在人间的一道清流，穿越时光的峡谷叠嶂。

旅行就是发现自己的一切，那个脆弱的自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坚忍、从容、淡定、阳光的自己，从细小的幸福抵达安宁的自己，坐在梦想与现实的黑暗边界闪闪发光的自己。以欣赏湖泊、山川的情怀去注视尘世，以仰望星空的襟怀来应对生活的林林总总。生活既可以制造地狱，也可以制造天堂，所谓的天堂和地狱，都是心和行为造就的。从西北大环线到乌兰巴托，从绍兴、富春江到万隆、万宁，从金阁寺到箱根，乃至最后的北京紫竹院公园，旅途不啻是世界给人开出的药方，风景与心灵彼此关联，这一切源自命运与人的纠缠不清的神秘关系。

人的最高幸福是安宁。在安宁中，思想、情绪乃至所有的灵性之光在身体里隐居。在自愈、自息、丰盈中，性灵的生活、心灵的镜像便可自相映射。“人的肉体内，住着一位真人，那是没有地位、没有头衔的真实自己。他可以从人的任何部位自由进出。”人要爱自己，时时刻刻凝视真实的自己。那些天赋较高、较为特殊的人，大都时而年轻、时而年老，就像他们时而欢喜、时而悲戚。

品鉴

抱朴守素与移梦造境的融合

赵亚东诗集《稻米与星辰》 □姜超



让诗人在内心世界记录生命的真实和丰收，这是赵亚东诗艺不断变化中的“恒常”；而寻找有价值的形式，书写有意义的生活，则是他孜孜以求的“新变”。新近出版的诗集《稻米与星辰》呈现了上述特质。

赵亚东诗歌的形象、视觉、意象总是与乡土世界紧密纠缠。“土豆”“马厩”“村庄”等意象频繁出现，频繁梦见乡下的动植物，要多于梦见城市的人造景观。赵亚东将早年对乡土世界的情绪藏在深层的潜意识中，习惯从熟悉的乡土世界寻找客观对应物。他有大量表现乡村世界生死哀荣的作品，不但一腔热忱记述物事，还怀恋美好的人事。《在乌兰诺尔》《歌马滩》等诗作充满温馨温暖之气，美好的回忆炊烟般向上攀升，诗人在精神还乡中抵达自我救赎。

丰盈多姿的画面感，不凡的色彩表现与色调应用，是阅读亚东诗歌的强烈印象。亚东对乡村风物的热恋一如既往，他的诸多乡村静态摹写，画面感强烈。“真好啊，谷子一低头/小米就要被生下来”，从《野稻子》一诗中可以窥见亚东诗歌的写作意义，他在快节奏之间让观察对象由“心入于境”而抵达“神会于物”，有时他给读者的是一幅淡淡忧伤的山水画，有时给读者的是满纸悲怆的大写意。

追问乡关何处，铭记渐渐稀释的乡愁，这些复杂的情愫统一于赵亚东的诗歌中。“夜幕缓缓合上，我追逐着最后一道光/寻找那双操纵时间的手/可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却和那个黑夜中的陌生人撞在一起”。这些诗句由物及象，意象、幻象交织却朴素有力，个体的经验成为很多人接受的普遍经验。赵亚东诗歌创作中多次提及的“飘游河”“乌兰诺尔”等精神乡土，是将他人的故乡视为自己的原乡。此种精神地域诗歌写作，已非乡愁与悲情的简单表现了。

寻找有价值的形式，书写有意义的生活，一直是赵亚东孜孜以求的诗艺方向。赵亚东乐于使用幻象，生成的诗意颇似神话传说式的移梦造境。造境，是诗人开拓主观精神世界的艺术创造活动。亚东凭借自身对“生活幻象”的体验，融合了自己情感、道德判断、审美认知等，构筑了诗歌中不同的意象表达，艺术地实现了从现实之境向心灵世界的幻象之境的跨越。

赵亚东的诗作经常主客易位，“被显现的客体就是显现的主体”，他也将这些落实为诗歌创作中的虚实处理。《我在这世间两手空空》是虚实分写，情景互见；《地址不详》是实象涵虚，融情入景；《藏不住的影子》《札记》等是虚中有实、藏景情中。“笔着于纸有虚有实”才妙，虚实的和谐应用才会让诗艺飞升，正如范玖在《过云庐画论》所说，“人知无笔墨处为虚，不知实处亦不离虚”。

诗人总是难以割舍生活予他的苦难，更愿意视之为写作的富矿、诗意的缘起，赵亚东的疼痛时潜时隐，在皮里膜外如影随形，在灵魂里游荡。一方面，他希冀从苦难中炼金，于蚌壳里磨亮珍珠的光泽；另一方面，诗人渴盼让生活生出双翼，任凭心灵自由飞翔。亚东的诗更像是一个美的矛盾体。

跳出摹写生活、直诉现实的经验书写轨迹，将超验作为观照存在的视角，无疑是赵亚东近些年诗歌创作的重要探索。他早年的诗句还带着清晰的想象痕迹，如“白天的尘埃在夜里转身，一个人/全身的血也比不上那颗醒着的露珠/这个城市轻得可以被一只蜻蜓驮向远方”“那些干净的燕子，在高压线感受着远方的震颤”，这些诗句重视想象和节奏，对第一手经验的处理让诗歌有了动人的力量。《暮雨》等近作不断刷新既定的经验，前置主体的感受，从而获得全新的审美经验。“一滴清凉的泪水，从叶脉的深处滑落/刚好照亮了松针上的火焰”，这样的诗句化熟悉为新奇，通过陌生化激发诗人艺术上高妙的领悟。

在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赵亚东有自己的探索。《祭外婆帖》是一篇佳作，它深接地气，在简洁的叙事中传达出复杂的人生认知，显示了深邃而持久的力量。《二姑》《妈妈草》《刘晓静》等作品让人感受到草芽拱开硬土壳的微弱力量，花香弥漫世界的温柔力量，水石醒来的记忆力量。而那些回忆少年伙伴的系列诗章，带着朴素的情感和冷静的叙述，一种沉静内敛的中年味道跃然纸上。早期的《黑河信札》《和卓卓一起散步》等长诗尚有理想主义的光辉，诗人还仅仅把叙事作为一种手段，作为抒情的有效补充。近年来，叙述在赵亚东诗歌里变为一种主观判断，说什么、怎么说等叙事因素带着深厚的阅历与理性认知。亚东遵从内心的需要，将青春的大赋改写为风霜雨雪的小令。他沉向生活的诗歌，开掘出了一种洗尽铅华后的质朴。

百家品书

长达50余万字的《中国冬奥》摆在案头，沉甸甸的，边读边思，让我对孙晶岩再一次刮目相看。认识孙晶岩多年，她给我最初印象，就是一个不惜力的实干家。当年她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学校组织师生一起到亚运会建设的工地上参加义务劳动，全班30多个同学，劳动中最踏实努力的就有孙晶岩。时间一晃已经过去30余年，孙晶岩仍然是忘我投入、毫不吝惜自我的干大活干重活的人。已经年轻的她，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大地山川，进行田野调查，做大量人物访谈，爬梳浩瀚的史料，如蜜蜂采蜜般地营造一个巨大的文学工程：写西气东输的《中国动脉》走遍管线建设沿线；写北京市对口援疆工作的《西望胡杨》跑遍援疆干部所在的新疆地面；写法制系统基点的《中国看守所调查》跑了十几家看守所；写《中国冬奥》遍访世界冰雪运动强国，采访国内外200余位与冬奥运动相关的人员。她何以有如此的精神和激情，何以如此不知劳苦追求极限，成为文坛上的“举重能手”呢？

奥运会的体育比赛，是竞技、是狂欢，是人的智慧与体能的充分展现，是公平公正原则的精彩显现，是全世界五大洲人仅有的欢聚场合。这里跨越肤色、跨越种族，甚至暂时跨越贫富，让那些赤着脚踢球和跑步的孩子也有机会展露自己，让那些残疾人也走上前台，展现其顽强拼搏的意志，受到欢呼，得到认可。这是全世界体育文化所共有的。对于中国人来说，体育运动就具有更为复杂的内蕴。在积贫积弱的年代，被鸦片毒品和裹脚陋习所造成的“东亚病夫”，成为摆脱不掉的耻辱象征。知耻近乎勇。中国的现代体育发展是与民族现代进程同步展开的，毛泽东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即是明证。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中，体育竞赛的突出成绩则成为鼓舞中华儿女奋斗和崛起的巨大精神力量。1960年代的乒乓球旋风，1980年代的女排精神，都是鲜明的例证。20世纪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华民族经历了最危重的灭亡危机，走过了最为艰难的求索之路，风云跌宕，柳暗花明，不得不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征用一切可能征用的资源，鼓舞全民斗志，凝聚民族精神，以能够冲出去迂回曲折风浪险恶的历史三峡而走上坦途（历史学家黄仁宇语）。《中国冬奥》的“尾声”中，孙晶岩写道：“2022年北京冬奥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中华文化能够在世界上展示出来。这次赛事的举办和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还有点区别，因为当时我们的国际地位跟今天还有很大的差距。经过这么多年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国际影响力也有很大改观。所以利用冬奥会这个机会，可以更自信地来展现我们中华的文化、中国的色彩。”北京冬奥会成为展现中华文明和中国气派的大舞台，《中国冬奥》则把这种精神气象用文字的方式记述下来，让它成为一种可以保存、可以流传的文化形态，为中国奥运留史。志存高远，视通万里，这才是孙晶岩的创作激情持久燃烧的能源所在。

还需要强调孙晶岩的文化涵养、知识储备与炽热的学习进取精神。多年间奔走于中华大地上，她对于许多地域的历史文化都有一定的研究。对京北（平北）抗战历史的研究，让她讲起冬奥场地之一的延庆海陀山，可以滔滔不绝、纵论今昔；她自诩精力充沛，背着沉重的专业相机翻山越岭，收在《中国冬奥》中的若干图片具有专业摄影水准，图文并茂，相映生辉；她的性格平易近人、热情真诚，很容易让被采访者打开心扉；她的旧体诗写得像模像样，不时地出现在严谨缜密的文字中，调节了作品的氛围，增添了叙事的弹性；她的写作范围甚广，涉及很多知识，这种学习精神可圈可点。即便同是表现体育范畴的北京奥运会之《五环旗下的中国》，和冬奥会的竞赛项目之间，其知识点也是大相径庭。比起夏季奥运项目的熟悉程度，冬奥会的诸多项目在国人开展仍不普遍，尤其是雪上项目，对孙晶岩来说是所知甚少。要在自己的笔下全方位表现奥运筹备工作，首先是要补充大量的专业知识和实地体验。为深入了解对抗性很强的冰球项目，孙晶岩从海外一路走过，到北美观看美国和加拿大国家冰球队高水平的冰球比赛，感受顶级球队的竞技魅力。她前往齐齐哈尔和哈尔滨采访冰球运动员及教练，和女子冰球队队员同吃同住，在近距离接触中熟悉中国冰球现状和运动员的身心状态。为更好地了解越野滑雪和冰壶项目，除了采访有关人士，她在中国东北雪场跟教练学习越野滑雪，在温哥华冬奥会冰壶场馆采访期间与当地民众一起练习打冰壶……这正好印证了中国的古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以上充分体现了终身学习的时代精神，也是孙晶岩从事报告文学创作30余年来常写常新、源源不绝的根源之一。信息爆炸，科技飞跃，时代命题转换，加上崛起中的中国速度，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既是机遇，给他们提供取之不绝的创作灵感和创作题材，也是挑战，要考验他们对时代、对文学、对社会变迁和代际文化的不倦关注与追随进取，要不停地吸纳新知，更新自我。孙晶岩正是凭借强大的学习能力，获得可持续写作的能量，才能够站在时代的潮头，对时代的一个个重大命题作出及时敏锐而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学回应。

所谓全方位，对《中国冬奥》而言有两个层面：一是对竞赛项目的全范围覆盖，尤其是冰壶、雪车、北欧两项等，借此向国人普及冰雪运动的各种魅力；二是围绕北京冬奥会筹办的各方面进行地随式检阅。大纵深掘探，前者可谓按图索骥、填补空白，相对而言容易实现，后者则更考验作家的眼光和见识。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是一项综合工程，加速中国的全球化现代化，成为中华崛起、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孙晶岩为记录这些作出积极而有效的努力。

北京冬奥会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是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作家从北美到北欧，考察其冰雪运动的起源与现状，踏访冬奥会诸多举办地，如加拿大赛普勒斯滑雪场丰富的适合各种年龄、各种锻炼强度的众多冰雪活动，除了常见的滑雪板，还有雪鞋漫步和滑雪胎溜雪，吸引更多中老年人也参加冰雪运动。她写“走出去”，也写“请进来”：崇礼云顶滑雪公园的创办者、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企业家林致华开发了崇礼云顶滑雪胜地的潜能，还推动了国内申办冬奥会，呈现出民族情怀、商家智慧和战略眼光的交织；冰壶比赛冰场的世界首席制冰师汉斯来自白求恩的国度，和中国的工人一起在职工食堂吃饭，对工作精益求精，让我们得知那看似寻常的冰壶竞赛场地是怎样分层精心制作的，其敬业专工令人叹服；更有中国运动员的“走出去”和外国教练的“请进来”，王北星赴海外接受外国教练的指导，从国内受训时的“要你练”变成“我要练”，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竞技水准，也比照出中外教育的差距，其意义远远超出体育教育的层面。

强化环保意识，也关心扶贫和发展经济，这是当下的前沿课题。环保奥运、低碳奥运在北京冬奥会中如何实现，这是《中国冬奥》中的一个亮点。身患癌症，长期奔波在延庆赛区的交通运输部环保专家蔡志洲，祖孙三代都有人研究生物生态，来到延庆工地后始终盯着“水气声渣”，锱铢必较、寸土必争，树木不能多砍一棵，人员车辆不能越界半步，一切为了可持续发展。同样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还有冬奥经济、冰雪经济，大面积贫困的河北崇礼，正是借助得天独厚的冰雪运动场地建设而走进人们的视野，通过服务、保障冰雪运动和旅游，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与此同时，环境保护同样体现于其中，大到为了辽金朝代太子城行宫遗址保护而改变施工方案，小到对一座有近200年历史的天主教堂的遗址保存，无不体现出文化中国的自觉与珍惜。

以上摘写的一些方面，仅仅是《中国冬奥》磅礴浪潮中的点点浪花。长路漫漫，愿孙晶岩继续前行，不负读者的厚望。

全方位地写出中华崛起的精气神

——孙晶岩《中国冬奥》简评 □张志忠

